

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报告

——1982年7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
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的报告

（根据录音整理，仅供内部学习使用）

北京师范大学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印

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报告

我到部里才两个月，两个月以前我休息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在这以前是在一个学校工作的。中央组织部找我谈，我说我自己是井底之蛙，看的面非常局限。我到部里的时间短，还没有找司级的同志仔细谈过话，要我讲话实在是相当困难的。部里现在的重点是按中央的部署，改革指挥机关。今天谈的三点，没有很多把握，提出来给同志们讨论，交换意见。同志们有这么个机会，特别是师大的同志作了许多工作，来学习和研究一些新问题。我是作为参加讨论，发表一些看法，很可能是不妥当的。今年我们准备开一个普通教育方面的会议，主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进一步普及小学教育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是中等教育结构问题。这是一件事情。这个会，原来准备八月份开，可能来不及，要拖到十二大以后。也就是说有些问题光教育部定不了，要和劳动人事部、计委商量，如果意见一致就早一点开，要不一致，可能还要拖一拖。再一个，准备在年底左右，开一个高等教育的调整改革会议。这个月底，先请各个地方的同志，主要是学校同志，来开一个通气会，高等教育调整改革方面，打算解决些什么问题，作一些准备，还会正式开会的。这个会议还在准备当中，有些还没有定下来，因为问题涉及的面比

较宽。下面讲几点意见：

（一）有关教育方针问题。教育方针，就是教育工作的总的基本的指导思想。这个问题，怎么提法好，上一次彭佩云同志来的时候她已讲了。这个提法，那个提法，其实是一样的，表达形式前后有不同，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，怎么提法好，要明确这个问题，主要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，把它搞清楚。有些同志反映说，彭佩云同志没有敞开讲。这个问题是不大好讲的，涉及到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要中央来定。在1980年，教育部开会，这个会我参加了，没有提这两个“必须”。有的领导同志主张不要提。这倒不是说这两个“必须”是错的，没有错，但是要根据当前情况。后来又开会，大家又提这个问题，请示中央，中央的同志又说还是提，后来有的领导同志又说还是不提好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好像不是很一致的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问题是怎么提更好一些，使做教育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共同遵循的东西，指导思想比较明确。经济工作方面，赵紫阳同志在人代会上的报告，讲了十条，十句话。这十句话，是不容易讲的，因为这是要总结我们三十年的经验，分析我们当前的情况，经过归纳出来的。三中全会以前，恐怕提不出这十句话来，三中全会以后，很快要提出来也不容易，是去年才提出来的。经济工作有那么十条指导思想，十条方针，那么教育工作的方针，究竟怎么提，我建议同志们都想想怎么提好，总结过去的经验，包括错误的经验，怎么提合适，一句

话好，还是提几句话好；总之，教育的指导思想、现阶段的指导思想，把它搞明确，当然最后要由中央来定。可以是一条，也可以是两条，也可以是三条，也可以是几条。这些问题，教育部党组议过，还没有定下来。就是定下来，也得请示中央，中央定了，那才算最后定。现在觉得对教育工作关系比较重要的几条指导思想有：

第一条就是教育要跟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协调，也就是这里有一个比例关系问题，这是一句话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们有个认识过程。毛主席在1956年讲十大关系的时候，没有这一条。当时，只讲解决穷的问题、一穷二白的“白”的问题，怎么解决教育要跟国民经济相协调，没有作为重大方针问题，跟经济问题的关系问题提出来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党内存在轻视文化教育、轻视知识的“左”的影响。文化大革命是登峰造极了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、“臭老九”，现在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。但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已经定下来，要解决这个比例关系问题，协调问题。

中央84号文件里头，正式提了普及教育，要使教育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。当前要着重克服“左”的影响，小生产的影响，这是一句话。这句话要是明确了的话，各级党组织都清楚，与教育工作关系很大，如不明确，教育工作的前进必然要步履艰难。从高等教育来讲，如果说百年树人太长，高等教育，从大学生入学起，四年、五年毕业，再经过五年才能独立工作，那么就要十年树人。如果从小学算起的话，那么就是二十五年树人，二十几年。今年招

的学生，实际上已经是‘七、五’的人了，‘六、五’已经赶不上。最近召开了一个计划工作会议，紫阳同志讲了话，现在大体是这么一个概念，经济情况，一个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的经济，自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以后，调整的三项任务基本完成，第一是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；第二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，重的太重；第三是财政赤字太大。从压缩赤字、压缩基建、调整轻重这个意义上讲调整任务基本完了。但是，更深一点的调整还没完，产品结构、企业结构、管理体制合理化没完。财政经济情况好转，但是，还没有根本好转，我们财政还有点赤字，而且是在建设规模不很大的情况下的赤字，如果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有点赤字，那问题不大，现在是规模不很大的情况下的赤字。我们的速度呢？现在看，八十年代还快不了。今年上半年重工业增长是11.3%，轻工业增长9%点几，平均十点几。原来是争五保四，上半年10%。原因一个是去年比较低，今年容易高，这是第一点。去年的生产，第三季度上升，第四季度上去了，比较高，第一、第二季度很低，就显得今年一、二季度比较高了。但是这个高速度保持不了，下半年还得下来，由于煤源非常紧张，煤炭有，但运不出来，运输紧张，这两个情况现实摆着。第二是能源非常紧张。第三，产品结构、产业的结构，还不合理，还需要深入的调整，相当一个广度、深度的调整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的调整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今后八年，已过去两年，八十年代这十年的重点，确定下来是这几件事情，

农业、能源、运输，再一个就是教育科技，这几项。这几件东西上去了，然后经济情况调整好了，那么到九十年代，外国话讲起飞，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有一个比较持续的、年增长速度10%左右的、对人民有经济实惠的这么一个振兴时期。这样，到二〇〇〇年可以实现两个倍增。八十年代几条里，一条是科技，一条是教育。教育、人材被搁在这么一个位置上，而且要考虑到二〇〇〇年，二〇〇〇年以后更高的水平。因此，中央提出来要抓基础教育，抓学前教育。学前教育和小學教育变成人材的话，大体是九十年代的后期、二〇〇〇年的事。说明中央是重视教育的。万里同志找我们教育部的领导同志谈话，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“万事俱全，就欠人材”，要把人材出好，再一个就是把人材的作用发挥好。比如，中学结构改革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，即使这一职业教育办起来了，如果社会用人还是顶替制度，不是择优录用，那人材的作用是发挥不出来的。高等教育培养出去，拿了大学文凭，就是铁饭碗，这作用也发挥不出来。教育制度要改革，人事制度要改革，工资制度要改革，劳动制度要改革，四个改革结合起来，这样花的钱比较少，培养的人比较多，而且作用发挥得好。所以，‘六、五’期间开始，教育的费用要逐步增加，从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来看，这是一条，即教育要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，当前要克服“左”的影响。而且要早一点抓，要不早抓，将来九十年代，经济发展要快也快不起来，基础没打好，就象没有能源一样。加工工业能力是有的，很快就上去了，但

是能源紧张，结果就得拉闸，那么，人材问题也一样，而且培养周期比能源建设更长，这是一条基本的方针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的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，研究最大限度地、最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高度文明、高度民主、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。简单来说是为社会主义这两个文明服务的问题，也就是现阶段的教育为政治服务。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这个。1980年初，教育部开会，按中央同志意见会议上提的，教育服务的目的是什么？怎么样最好地为这两个文明服务？当然这里头要研究我们的国情是什么，不适应的要改进或改革。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更具体的指导思想以及关键性的问题，还要进一步研究。概括地讲，这是一句话。

第三条或第三句话，是三十年的《决议》里头讲的，用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想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人民和青年，培养又红又专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。这里有指导思想，也有培养目标。过去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，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，表达形式有些不同，实际一样，这是第三条。

对教育工作，前一条当然不是教育工作本身的问题，是教育跟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到问题。后两条，一个是服务目的，一个是培养什么人，什么指导思想来培养，这是根据中央的文件和中央同志的讲话，我们觉得有这么三句话。那么，这三句话如何表达更准

确？这三句话够不够？还要加什么不要？请同志们考虑。总而言之，明确这几条，是不是必定非得有几个简单的口号来代替它，还是用几句话把它说清楚，有所遵循好，再就是用简单的几个口号式的话，好记，好传，但是理解上容易不清楚，倒不是错误，究竟怎么好。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问题，我想提这么几点看法，请同志们一起来研究，这都是要请示中央定的东西。光有总的指导思想还不够，每个具体工作时期里头还要有工作的重点，每一类学校也有它自己的重点，还有具体的方针，譬如，小学教育，除了共同的东西外，当前，就全国范围来讲，我们三十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普及小学的问题，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普及小学教育。日本战后破坏得很厉害，有一段他们也很困难，后来上来了，由于什么呢？就是飞机炸不掉的，原子弹也没有炸掉的，就是它有人。明治维新以后，它抓教育抓得比较狠，当然它们的教育是军国主义的，反动的。但是抓教育这一点，抓人的培养这一点，值得我们考虑。我们现在当然也有困难，但是不是比日本还困难，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还困难？日本打中国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七百万吨钢嘛，那么，我们狠狠心能不能就普及了。中等教育，当前就是结构改革，缩小普通教育的比重，扩大职业教育的比重。今年，报考高中已经降到了三百四十万，究竟降到多少为好？这个问题还要研究。高中毕业生有几条路，一条靠普通的高等教育，再一条靠电视大学、函授这一条腿了，究竟几个取一个好，太少也不行。职业教育、中专、中师、师

专再加上其他的，大体上一百万。总共初中以上的青年大概四百多万，那条腿看起来短了，要加强，中学有个结构改革问题。高等教育今年也是要把改革调整提上日程。“八字”方针，每个时期八个字都是互相联系的，但在一个时期有所侧重，也还要有具体工作方针。那么，当前我们整个的战略时期，教育究竟怎么体现这个时期的特点，而把基本东西能包括进去，怎么提法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同志们学习那么久，大家也都有经验，请同志们一起来考虑。

（二）关于高校的调整改革问题。经过三十几年的努力，中间有十年的大破坏，以后又恢复6年，现在我们高等学校有700多一点。大体上，1957年以前是200所，1958年以后到文革以前又是200多所，加起来400多一点，然后，“文化革命”中间，校数曾经下降过，大概300多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又恢复了些。高等教育有没有调整改革的问题，现在看来任务还比较重。高等教育还不适应，一个从数量质量上，还不适应需要，尤其考虑到教育现在培养的人要满足九十年代的需要，这样来看的话，规模肯定是小了，质量还不够高。再一个，就是从人材的各种关系比例来讲，还很不适应，需要调整。现在，我们高等教育的科系设置，从‘一五’期间，那时候国民经济计划学的苏联的，高等教育的学校专业设置也是学苏联的。1958年以后，大概人材培养，就没有很好地计划了。这几年，大体上是计委、教育部下达的，都是招生数字。招什么样的人，没有法管，因此，这中间存在一些盲目性，存在一些不适应。77级

毕业生，据说有一万人不对路，有的是冶金方面的，有的是军工方面的，有的是文科小语种，再一个是二机部系统的核物理，据说有一万人。这里，可能有假象，有各种原因引起的假象，一个原因是，我们有许多新专业，用人部门不知道，需要开个展销会，才能推销出去。再一个就是对专业的理解太窄了，如核物理，核物理就是物理嘛，物理可以到工厂去，也可以去教中学，如果这两条一打开，大概就不够了。再一个是有些单位超编，不合格的劳动力吸收得太多，而真正合格的都吸收不进去了，它不要。因为，我们中断了高等教育，1966年到1972年，六年没有招生，招生以后，相当一部分质量是不那么高的。一下子就那么过剩，可能有假象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肯定也有不适应的方面，这个不适应需要调整，调整就涉及到改革，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能够跟我们的国情比较适应。从外部讲我们要争取一个合理的比例，包括投资要有合理的比例，不是要减，而是要增，前面紫阳、万里同志讲话都表达了这个意思。但是，另外一个我们内部也要搞得适当，就是以最小的投资，产生最大的人材的效果，不简单是个经济效果，也不好用经济效果来算，如培养哲学工作者，什么经济效果就很难讲了，总之，要产生最大的效果是对的。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培养的人，严格讲是‘七五’，更准确讲是‘八五’，‘九五’，九十年代的人。那么，如何避免盲目性，完全避免当然困难，但至少减少盲目性，使它比较能适应，这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。否则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

了，不对路。同志们，一万人就不是一个小的数字，如果培养四年的话，一人一年2000块钱，那么8000万就不见了，浪费掉了，而且人材还不能用钱算。这边多培养了一万人，那边就少培养一万人，而且一万人是国家急需的，却没有培养出来，这个损失是很大很大的，比铁路翻一次车，比出“渤海二号”那个事，损失要大。这里要调整科系比例，第一个需要调整。现在看，大的来讲，高等学校文理结构，文那条腿太细了。我们的工科规模占36%，三十万里头占36%就9万多了。据说美国每年工科学生招的是6万多，当然，有人讲我们人口多，我们是十亿人口的国家，但工科跟人口不能成比例，医生跟人口成比例，因为有人生病就得看病，而工科只跟工业的规模成比例。我们工科的人材在产业工人总数里头比例还是低的，但军工比较高，轻工很低。但总的讲我们的规模不算太小了，比日本大。理科现在我不敢说，就文科来讲，有几个是缺得很厉害的，财经，政法，管理，缺口很大。今后的人事制度的改革，干部“四化”，现在国务院明确规定进中央机关的、国务院机关的要高中、中专以上，低了不能进，现在我们部长换了一些，调整了一些。据万里同志讲，他通过各个使馆，跟各个国家比较，我们的干部，文化素质，不是政治素质，政治素质他们不能和我们比，讲文化素质，就是与不发达国家比较起来，也是不高的。而现在规定进中央机关的人就是中专高中以上。将来省政府、县政府，怎么要求，都应该有个要求。这些机关人员，究竟怎么培养，老的慢慢要

退出去了，新的要补上，怎么补，当然，也要有实际锻炼。很长时期我们只注意了实践锻炼，对知识化、专业化没有要求，现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，这就要由学校来解决了，恐怕光在党校短期学一下还不行，必须要有系统的教育。这种人怎么来培养，什么专业来培养，有的领导同志提出，是不是设个政治学专业来培养。这究竟缺多少人，要具体算。总之，文的方面来讲，如果要跟政法、财经、管理以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，包括我们高等学校就是理工农医的学校，也不能够什么人都用理工农医毕业生。外国学校里，教职员中教员和职工有一定的比例，职员的比例相当的大，而且文化程度都比较高，还不是说是什么长，就是普通管理人员，具体的教务员，这个员，那个员，它都是相当高的。日本我问了一下，它们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，问他有没有硕士，他说硕士有，不多就是了，一般是大学毕业，它职员的人数略少于教员，它的教员比我们少，师生比例大，但是职员比我们多。所以这个是严重的不适应。我们的理工农医是不是都适应呢，也不一定，工科里头，轻工业很少。军工院校出路有问题，工科内部，规模不小，比例不一定协调。卫生人员，如果面向农村的需要，也是个问题。就是从文理各科系来讲，横的比例是要调整，有的要发展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。

第二是纵的比例关系。纵的比例关系就是高级专业人员，中级专业人员，初级专业人员的比例关系。这个搞不好，就会造成高材低用，那么，国家花的钱就没有收到应有的效益。老的学校队伍老

化，教师队伍里，几乎都是讲师以上，讲师以上的教研组不断的出现，结果做助教的人减少。高等学校的人事制度要研究改革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有的系主任提出来说我宁可拿一个副教授去换一个实验员，没有年轻的，抬东西都抬不上去了。这也是一种比例关系，那么究竟是多少合适？高、中、初三级专业人员比例应该是什么样合理，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。这就涉及到高等学校的学制了。四年制、五年制、六年制的属本科，二、三年制的属专科。这几年，专科的比例是逐年下降，这个趋势究竟合理不合理？专科的比重，二年制、三年制的，1979年是占34%，1980年下降到24%，1981年专科学生下降到17%，逐年下降。中专的规模也比较小。另一条腿就是广播电视大学，这条腿基本上是专科。再一个是初级的专业人员，职业中学。农村，现在的农业院校招生规模还不小，但毕业生往下分配也有困难，那么要不要到农场，到农场多少，农业这一套体系怎么搞，纵的方面，看起来也有一个适应的问题，也有一个以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效益的问题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这都需要分门别类的作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。

第三个问题，考虑到我们国家比较穷，人口很多，底子比较薄，高等教育的概念，究竟应该怎么样合适。我们搞开放政策以来，派出去的代表团不少，包括教育方面。大体上是不是可以这么看，去看人家的名牌大学比较多，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比较多，要赶超先进水平吗，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得不够，不是说没

有，这是不是也属一种片面性？不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。高等教育的概念是不是可以考虑扩大一些，适应我们国家的情况。凡是超过中等教育的，小学凡年，中学几年，如十二年，超过十二年以上达到一定的要求的，都属于高等教育。高等学校的学制可以多层次，多种途径来办高等教育。既要要求高的，又要相对低一些的，但是低也是有要求，而不是粗制滥造，然后分门别类来考虑。就是农、包括林、牧、副、渔都在里头，农村先普及小学，普及中学现在还不成，小学毕业后，有一部分上初中，恐怕有一部分初中阶段就开始职业教育。农中，农中上头是不是就是农业院校，还要不要有农业专科，这个专科又是多长的学制，二年一年够不够，这都需要研究，这是面向农。医科有很大一部分也要面向农，师范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面向农，而且这几样大体上恐怕跟人口直接有关系。工科主要是跟工业规模有关系，但是有的面向大厂，有的面向中、小厂，面向集体企业，而集体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是要存在的，它有它的优越性。对于小厂，专业分得很细，学制很长是不是合适，学制适当短一点，专业粗一点，还是怎么好？高等教育的概念，看起来从趋势上讲要扩大一些，要多层次，学制上、规格上多层次，多种途径来办。另外一条途径是非面授教育要发展。中央的考虑是进口通讯卫星，然后逐步地比较广泛地设地面站，搞电视教育，发展非面授的函授、广播、电视这条腿，这样可以省一些，但是，这一类教育看起来，特别是在职的职工，要他坚持很长时间的

业余学习是很困难的。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一些人，坚持十年业余学习的也有，恐怕人不会太多，多数恐怕学制短一些更合适。第三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整个的体制结构。

第四个问题，我们1952年学苏联的时候只有300个左右专业，现在专业有一千来个，当然，我们可以作调查研究，现在的新名词叫人材预测，但是，不管怎么预测，要对得很准不太可能，多少年的经验也证明恐怕很困难。当然，采取一些措施，能不能搞预分配，提前一年搞分配，或提前两年，跟计委再商量。今年已经分配了，明年79级、80级学生是不是一次就分配了，等于提前一年，以后年年提前，这样于，不对口临时改一下，小改总可以。就是采取这些措施，专业太窄了也不适应，而且不利于质量的提高，特别是工科。比如机械专业，这个专业是很宽的，但是都戴帽，这个机械，那个机械，最多时大概40几种，现在专业目录大概1100多种，恐怕要并，要放宽。否则一不利于使用，二不利于提高质量，这个恐怕就要适当地作一些改革了，要下心解决这个问题，这里首先要统一认识，有的部门喜欢窄一点，过去缺人材的时候，为了保证人的分配，我这个部最好贴上一个标签，什么什么专业，别人就不能用了，其实，差别不大，这是部门所有制带来的一些问题，要放宽，经过大家讨论与专家商量，编一个统一的专业目录，尽可能地放宽些。

第五个问题，就是发展另一条腿，电视、广播、函授多种形

式，就是非面授这一条腿，还有夜大，业余大学，对成人教育，要有个较快的发展。现在，我们的电视，严格讲只有半个大学，即播放的时间很有限。买卫星要解决通讯问题，解决教育问题，买的卫星比较小，频道少，现在明确起来了，给教学的时间也不多。现在真正的教育电视台还没有一个。世界银行的贷款，首先在大城市试一试，建教育台，相应一套教材、教法都应该跟全日制不一样。现在基本上是全日制，因为电视播放时间是很贵的，不能象全日制大学那样敞开来讲，讲的时间要短一些，自学的比例要大一些，课程不应该完全一样，教本也不应当一样，要有另一套。再就是多种手段，函授广播结合起来，这样子发挥效果好，这方面要总结经验。再一个就是要提倡自学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这里有两个问题，包括职工大学，其他一条腿的，一个问题就是要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，不要盲目生产人材，造成积压，前几年，计算机、电子热，高等院校设计计算机专业的特别多，现在看，可能要过剩，有这个危险；第二个是质量问题，质量严格地说跟全日制完全一样，可能有困难，但是，总要保证一定的质量，自学有个考试委员会。要研究，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，质量还是要强调。但是，质量是多种规格的质量，没有一定规格的质量，那数量是浪费的，但是，也不是一刀切，现在对待业青年，中央有个考虑，把他们组织起来劳动并进行教育。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问题，解决社会的安定问题。也就不一定非要子女去顶替。顶替消极影响很大，当然不解决他们职

工老了的子女的问题，也是一个问题。顶替不是择优顶替，而是择劣顶替，他们的孩子确实没有办法的才拿来顶替，他不会拿最有办法的来顶替。这是第五个问题。总的讲，这条腿要发展。

第六个问题是，文科要发展，但是，文科如果要是跟培养干部结合起来的话，那么，文科就不能按培养秀才的办法来培养，如果考虑培养干部，招生是不是招有一些实践经验的，经过考虑，培养目标、培养的内容、培养的方法，恐怕要结合实际，培养出来以后，经过基层锻炼，这样成长为干部。文科有发展问题，也有个改革的问题。

第七个问题，关于面向农村牧区的问题，同志们提到这个问题了。今年万里同志在上次开会的时候谈到了，作了一点小的改革，有几个林区，从林区招收林区的职工和子弟，可以降低一些分数，招收一部分人，这部分人可能文化课的考核低一些，但是他有林区的实际经验，什么是红松，这种树，那种树，他从小就认得了，实际知识多一点。再一个就是在林区招一些师范生，进邻近院校，毕业后回去作林区的中学教师，提高那里中学的水平，当然，这不是马上见效的。采取了这个措施，今年试了一下，效果还得看一看。这是开始，然后，其他面向农村的，凡是第一志愿的，能录取的，愿意取就可以取，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小的改革。但是，从长远讲，究竟怎么好，要研究。但是，不是为满足农民为了考上全日制学校，最后拿到进城吃商品粮的证书。要满足农村的需要，这样招生办法